

新芽沙龙·第19期

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南亚

2020年7月12日

今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自新世纪以来面对的一场重大挑战，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为此，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新芽沙龙，邀请国内外青年学者就中国与周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发展进行研讨。本期沙龙聚焦中国与南亚地区关系特别是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会议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徐传博主持。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张婧的发言题目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如何影响中印关系》。她认为，作为一个自带印度教民族主义属性的政党，印人党对华的强硬态度似乎很难与这种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剥离开来，长久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也成为其赢得选票和凝聚国家认同的有力武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的蔓延，印人党政府利用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社会矛盾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印关系近年来的恶化仍然源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深层的文化内涵和政治逻辑。在这种印度教特性所构建的框架内，中印在边境问题上摩擦不断也几乎是必然的伴生现象。

从政治方面看，2019年8月，刚刚开始第二任期的莫迪政府迫不及待地将目光转向克什米尔。10月31日，《查谟-

克什米尔重组法案》正式生效，它为印度改变中印边境问题现状提供了法理支持，也成为了边境冲突的导火索。印度教民族主义一个核心主张是完整的印度，即要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边境的安全，以此建构一个印度教徒的圣地和理想家园。从印度独立起，与印度存在克什米尔领土争议的巴基斯坦和中国从来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心腹大患。印度近来也在边境问题上同巴基斯坦以及尼泊尔存在冲突，可见印度教特性所建构的理论框架在付诸实践后，不可避免地在印度边境地区产生了严重影响。

从经济方面看，莫迪政府在 2019 年竞选中提出要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使印度看到了机会，希望趁中国抗疫取代其世界第一大工厂的地位。不过，此前印度经济已经显现出衰退迹象，锐意改革的莫迪政府无奈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退出了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议。虽然这种保护主义与莫迪政府提倡的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相辅相成，但后者的前提仍是印度的大国崛起。随着新冠疫情在印度全面暴发，经济受到重创的印度离最初的大国梦渐行渐远。在这一背景下，中印边境冲突引发印度国内抵制中国商品的运动既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发泄，更有重塑印度与世界贸易关系的强烈诉求。此外，在印度越来越转向美国的当下，抵制中国货也成为了印度一个自然的选项。但这会加重印度在经济上的困境，一方面印度缺乏优质的招商引资环境，没有很好地融入全球主要的供应链，另一方面印度仍然在各方面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抵制中国会使印度经济的发展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从本质上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于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包括共同的国家、共同的种族以及共同的文化和文明三个要素。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把英国殖民者和穆斯林都视作印度这片神圣土地上的外国人，但本质上印度教民族主义也是反殖民和去西方化的一种心态和反应。在后殖民的语境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成了与这种价值相对的绝佳“靶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试图利用印度生活方方面面的中国印记唤醒印度的殖民记忆，中国也就成为了殖民在印度人心理上的一种替代物。

张婧认为，当前，印度虽更加公开地转向美国，但莫迪政府所实行的依然是战略自主的政策。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虽是印人党得以执政的基础，但总的来看莫迪政府在外交和经济方面还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策略。莫迪政府仍更多地寄希望于以强硬的态度和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左右逢源，迫使中国给予其更多的利益。不过，随着印度经济的不断下滑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印人党在中印关系的发展上可发挥空间较小。总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逻辑驱使下，中印关系的走向并不乐观。在此基础上，印度的经济和疫情发展情况还会将中印之间的关系带向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朱晓超的发言题目为《从近三年印度边境主要行动看“莫迪逻辑”》。自2017年至今，印度在北部边境地带发起了四次较大行动，由此造成了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事件、拉达克地区军演事件以及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

印度在边界地区采取的多次行动在国内和国际因素上

都有相似性。从国内因素看，都具有转移国内视线的作用。洞朗对峙事件是印度政府借掀起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对大吉岭骚乱的关注；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事件是转移大众对经济形势不满的有效手段；拉达克军事演习则是为了转移因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事件而带来的压力；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则是出于转移疫情和蝗灾导致的国内压力需要。从国际因素看，都以迎合美国制衡为目的。洞朗对峙事件和拉达克军演的时间，均正值莫迪访问美国前夕，莫迪需要用边界对峙迎合美国，以此作为访美的见面礼。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事件前夕，也发生了与美国有关的大事。贸易战使美印关系受影响，而美印关系在印度对外关系中又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印度必须以行动来缓和两国关系，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同样也可视为印度暗助美国。

但同时，印度在边界地区采取的四次行动也有指出，主要表现在印度选择的方向上。在洞朗对峙事件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上，印度选择在中印边界地区制造事端，事实证明这严重影响了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不利于两国的根本利益。洞朗事件之后，两国领导人经过努力使得双边关系得到提升。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中印也都愿意控制事态发展，维护大局。在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事件和拉达克军事演习上，印度则选择加入巴基斯坦因素来对中国施压，并不想把矛头直指中国。

朱晓超认为，通过四次在边界地区采取的行动可以看出，莫迪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同时考虑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在国内方面，往往以转移国内民众视线为主要目的；国际方

面则更多以“尽力迎合美国适当牵制中国”为手段。总体上看，这种决策多是“缓兵之计”，并不会改变中印两国正常外交关系的发展。2017年至今，印度在边境地区采取四次激进行动。由于中印、中巴边界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印度将来必定还会在边境地区挑事，对此中国应该做好充分准备。首先在战略上蔑视。中印关系正常发展是大势所趋，印度在边境地区的行动多因为国内矛盾引起。此外，此次疫情给中国甩锅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国家，而非印度，须分开看待。其次在战术上重视。面对印度在边境地区的行动，中国边防部队应适当增兵，同时可采取演习等方式给印方以震慑。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向印方发出信号：行动要适可而止，忍耐是有限度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段彬梳理了印度独立以来的北部边境道路建设情况及其影响。他认为，修建边境道路不仅有利于方便军事调动，保障后勤物资运输，加强战斗的可持续性，强化其国防能力，其行为本身也是一个国家行政管辖和国家主权的标志。同时边境地区的道路还能促进边境和内地人员、物资的交流和融合，加强国家的统一。中国和印度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地区围绕边境道路建设的博弈充分体现了地缘政治角逐的缩影。其中，印度在边境地区的道路建设可以作为观察印度对华边界战略的风向标。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抢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扩展所谓的以“行政管辖”为标志的“新前进政策”，边境道路建设在该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51年2月，“北部和东北部边界防御委员会”成立，随后提出了涉

及锡金、不丹、“东北边境特区”的评估报告，建议在这些边境地区重新组织和部署军事警察，修建机场和公路。根据这份报告，印度通过大规模的修建战略道路和直升飞机停机坪，在原始森林遍布的藏南地区建立起完整的航空线，而通过飞机空降物资给检查站，顺利将印度的防务边界推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60年3月，尼赫鲁政府为了克服边境地区各邦修路的拖沓和效率低下，专门设立了“边境公路项目”。由尼赫鲁亲自担任主席，国防部长 V. K. 梅农担任副主席，这个项目在北部边境各邦和尼泊尔和不丹大量修筑战略公路。正是依仗这些公路，印度在阿克赛钦地区大肆实施蚕食政策，最终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实施所谓的国防现代化，利用英美的军事援助，在印度实控线一侧加紧修建道路设施。“边境公路项目”也没有解散，变成了一个由印度国防部和交通部共同领导的军民融合的常设性的组织“印度边境公路组织”，专门负责印度国内灾难救援、边境地区的公路建设以及海外基础设施建设。1962年后的印度边境道路建设体现的是印度政府防御性的边界战略思维，即尽可能加强内地到边境各邦的公路和铁路建设，同时加强印控地区巡逻小道的建设，这客观上导致中印实际控制线的形成。但是，印度政府基于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教训，总体上在靠近边境地区不修建公路，实施“坚壁清野”政策，以免中国军队利用这些道路进攻印度，并且预想在边界战争发生后，可以利用崎岖的地形地势延缓中国的进攻速度，为争取印度军

队的反攻创造条件。在局部战略要地，印度仍然加紧修筑公路，甚至越境构筑工事，努力扩大己方实际控制线范围，这也导致 1967 年中印乃堆拉山口对峙、1974 年印度中锡边界修路事件以及 1986 年桑多洛河谷事件的发生。

2000 年以来，印度对华边界战略不再是单纯地沿着实际控制线进行防御，而是通过在边境地区修建 63 条战略公路，在满足其战略物资后勤保障的同时，依托密集的战略公路路网，利用边界地区的优势兵力对华进行小规模威慑。此外，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通过大量修建战略公路，在东段地区加强对实际控制线一侧的控制，同时在西段地区尽可能地推进，抢占更多的地盘，为今后确立实际控制线乃至划定边界的谈判制造有利条件。

段彬认为，1947-1962 年间，印度边境道路建设主要体现两个特点：一是印度政府独立初期的在边界争议地区强调修路所代表的行政管辖和拥有主权的象征意义。二是尼赫鲁政府专门成印度“边境公路组织”，修筑战略公路，使得印度在控制完东段地区之后，在西段地区实施蚕食政策，这最终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

1962 年后印度边境道路建设体现的是印度政府防御性的边界战略思维，即尽可能的修筑内地到地方各邦的公路和铁路，加强其控制和保障军事战略防御能力。但是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基于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教训，总体上在边境地区不修建公路，防止中国军队利用这些道路进攻印度，而且预想在边界战争发生后，可以利用崎岖的地形地势延缓中国的进攻速度，为争取印度军队的反攻创造条件。当然在

边境的局部地区，印度仍然加紧修筑公路，甚至越境构筑工事，努力扩大己方实际控制线范围，这也导致 1967 年中印边防部队在乃堆拉山口的对峙、1974 年印度吞并锡金后的越过中西边界修路事件以及印度抗议中国入侵桑多洛河谷以及建造停机坪的 1986 年桑多洛河谷事件。

2000 年以来，印度对华边界战略不再是单纯地沿着实际控制线进行防御，而是通过大量修建战略公路，满足其战略物资后勤保障需要，同时依托这些密集的战略公路，利用边界地区集中的优势兵力，对华进行小规模的战略威慑。除此之外，印度政府也意识到在中印边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修筑道路，加强对实际控制线一侧的控制，同时在西段地区尽可能地推进，抢占更多的地盘，为今后确立实际控制线，乃至划定边界的谈判制造有利条件，因为道路本身就标志着主权和拥有行政管辖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童宇韬的发言题目为《从洞朗到加勒万河谷：警惕中印边界问题的三个改变》。他认为，2017 年的洞朗对峙和今年的东拉达克对峙事件，本质上反映出中印边界问题正在经历三个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现状”乃至中印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中印双方在边界地区的实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印度的力量正在获得提升。中印在洞朗的对峙以及此次在东拉达克地区的对峙，起因都是由于对方在其控制区内的道路和桥梁修筑行动被对方视为是一种企图改变“现状”的行为。然而，近年来中印边界地区一直企图改变“现状”的恰好是印方，印度政府一直期望改变争议地区的力量对比。

近年来印度在边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突然得到加强，其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莫迪领导的 BJP 政府上台以后，印度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目前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印度在实际控制线一侧的物质能力已经有了显著提升。今后，随着中印两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活动势必也会增加，未来两国因为此类问题而产生摩擦和对峙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升高。因此，如何在对峙高发的常态下避免冲突升级，但又有效遏制印度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是未来中印边界面临的难题。

其次，现有边界条约对边界地区军队互动模式的约束力可能会降低。在中印边界很多地方，两国各自认为的实控线在现实中虽然有重叠的部分，但在有些地段某一方认定的实控线位置已经处于对方所认知的实控线后方。这种实控线认知的差异，在有的地方是大概只有几米，但在有的地段可以有数公里远。因此，每当对方巡逻队出现在己方认知的“实控线”之内，就会被视为是一种企图改变“现状”的行动。

鉴于划定实际控制线问题暂时无解，中印双方将重点落在管控上。两国先后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3 年）、《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6 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2005 年）、《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2012 年）以及《中印边防合作协议》（2013 年）。

正是得益于上述条约的约束，中印边境才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未曾发生过交火事件，在发生对峙事件之后也能够确

保双方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然而，目前的问题在于伤亡事件发生之后，印方是否还愿意继续遵守现有条约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印度在边界地区部署的军力日益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日益提高，印度有可能部分的脱离条约限制，如提升驻军规模、将越线巡逻常态化等，进而在边界地区制造既成事实。

最后，边界问题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如何将边界问题放在两国关系中恰当的位置上，是对两国关系未来一段时期内需要面对的重要考验。中印双方在 1962 年以后对边界问题的思路大致是搁置争议，让边界问题让位于其它重要的双边合作与发展议题。然而，在伤亡事件发生之后，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高涨。目前，在边界对峙问题上，印度的解决思路依然是要逐渐淡化冲突，和平解决问题。但在其它战略问题上，印度可能会采取对中国更加消极的态度。未来，中印边界问题在暂时无解的状态下，边界问题势必有可能成为整个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对其它中印关系可开展合作的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来看，挑起与中国的边界冲突或者将冲突升级并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当前，印度政府最希望的还是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左右逢源，为印度谋取最大的实质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也一直奉行与邻为善的外交政策，希望能与同为新兴大国的印度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希望在此次东拉达克对峙事件结束之后，中印关系也能像从前一样通过对话重回正轨，将中印边界问题置于两国关系中一个恰当的位置之上，避免边界问题成为中印关系积极发展的障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隋雪濛的发言题目是《从中美印战略三角来看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自莫迪执政以来，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一方面美国直接干预中印边界争端的意愿上升，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愿意调解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另一方面美国表态更偏向于印度，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中国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性行为。从中美印战略三角关系角度看，促成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有以下几个因素。

长期来看，在中美印战略三角关系中，美国可以从中印之间的对抗中获取利益。中美关系和对华战略是美国战略的主基调，中印关系和印美关系的走向，则是美国介入中印边界问题的一个门槛。而在当前疫情刺激之下，美国的动机更加鲜明，也更加明显了。首先中美关系从之前的竞争向对抗加剧的方向发展，这可能会增加美国干预中印边界问题的意愿。同时，中印关系由于受到疫情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影响，从之前平稳走向逐渐冷淡甚至恶化，这也增加了印度拉拢美国的意愿。在中美关系和中印关系双重变化的影响

下，印美更加靠拢了，向着更为积极合作的方向发展，这也增加了美国干预中印边界问题的能力。中印关系和印美关系的变化，又降低了美国干预中印关系的门槛。因此，在疫情刺激以及中美印三角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可以看出美国干预中印边界争端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上升，这由此导致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变。

根据分析洞朗对峙事件以及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发生

前后中美印三角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中美印目前正处于“稳定婚姻型”的战略三角关系状态中，即美印联手对付中国。这种情况下美国会进一步提升它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它的立场偏向印度，尝试去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探讨一个新问题：未来美国的态度会如何发展？中美印三角关系又会向何种方向发展？

隋雪濛认为，中美关系未来会向对抗甚至发生冲突的方向发展，从近期美国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尝试重塑产业链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中印关系中边界问题未来可能会逐渐缓和，但受疫情影响，以及此前中印双方在经贸方面突显出的一些矛盾可以推测，中印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会进入一段冷淡期。印美关系受中美关系和中印关系的双重影响，将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在这种三角关系发展趋势的影响下，美国的态度将会发生改变，一方面它会更加积极关注中印边界之间的争端，其立场会更明显偏向印度；另一方面美国会进一步尝试积极介入相关问题。然而，由于受到中印关系缓和以及印度需要中美平衡战略的多重影响，美国介入相关问题的门槛也会受到限制，有可能只是有限地介入，比如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介入，不会完全明确表示站在印度一边，但会以参与调解和仲裁为理由，派遣官员和军官团到前线探访，暗中表示其对印度的支持。

针对上述可能出现的新变化，隋雪濛提出几点思考。对于美印联手，中国如何破局？特别是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如何削弱美国因素？美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上展现出的态度

与在南海争端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如何通过分析中印边界问题为化解南海争端提供借鉴也值得关注。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张洋以中印边境冲突为背景分析了 manthan 对印度对外政策的影响。

manthan 源于印度教创世神话中的一篇著名故事《搅动乳海》，讲述的是神仙和阿修罗为了获得不死甘露而共同搅拌乳海的故事。传说阿修罗和神仙都是天界的神灵，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但战争的结果总是以神仙胜利而告终。有一次在阿修罗王巴利带领下，神仙被打的东躲西藏，就去求毗湿奴大神。毗湿奴让神仙和阿修罗一起去搅拌乳海以获得不死甘露。曼陀罗山被当做搅棒，蛇王被当做绳索，而毗湿奴则变化为巨龟，沉入海底当作搅棒的底座，巨大的乳海被搅拌成油脂，不断有宝物出现。搅拌过程中，蛇王无法承受巨大的拉力而喷出大量毒液，为了不使毒药流落人间，湿婆吞掉了毒液。不死甘露终于被搅出，分配甘露的时候，阿修罗一拥而上，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毗湿奴化身为一位美女，将阿修罗迷住，最终甘露被神仙分享。阿修罗恼羞成怒，与神仙爆发战争，但是因为没有甘露的帮助最终失败，从此被赶出天界，成为了魔鬼的代名词。

张洋认为，manthan 是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世界观中的重要观念，意为混乱、搅动是世界自然的状态。成功就是需要消减不利影响，从有利因素中获益。印度与中国在 2020 年的边境对峙前后，体现了这种思想，能进时则进，需退时则退，能趋利时则趋利，需避害时则避害。

比如中印洞朗对峙时，印方认为中方在争议地区修建公

路，改变了现状，但印度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修建边界公路的计划。在对峙期间，印度还决定增派工人试图完成修建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一直保持着推进维护自己利益的姿态。在经济方面，印度从6月底开始禁止民众使用59个中国手机软件，莫迪关闭了自己的新浪微博账号；7月3日印度电力部门提出对中国进口的设备进行限制。可以看出，印度希望通过这些经济手段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利益，同时将双边问题上升为吸引国际支持的砝码。

张洋指出，manthan 包含着一种竞争关系的行为理念。在与中国的领土边界竞争中，印度以维护本国边境利益为目的，极力阻挠中方在边界势力上的增势，对中国修建边界公路进行阻挠，同时不断完备本国的边境道路建设，这种行为背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驱动着印度不断获取利于自己的因素，避免受到不利于自己因素的干扰。实际上，中华文明也有趋利避害的思想，包括《周易》中也提到应通过积善变通，各从其类，此外还有“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的理念，这些理念包括了追求和、追求中庸的思想色彩。而 manthan 反映的是极度的趋利态度，并且不排除反悔先前的约定。在中印两国对待利益和竞争观念方面，印度更趋向于不退让，极力维护本国利益，而中华文明更讲究变通中庸。两国对待问题的态度不同，导致对待争端的做法也出现了差异。文明有差别，但无高下，从传统价值观角度分析对外政策，有利于精准把握国家行为背后动因和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叶海林在点评时认为，多数人认为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受国内、

国际两方面因素影响，包括有观点认为印度这样做是要转移国内因疫情给政府带来的压力，但这样的逻辑是有很多问题的。首先，所谓转移视线是印度的政策，还是观察者对于印度政策的想象？如果没有一手资料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其次，从政治动机上看，印度疫情的严重度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三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是否被外界高估？印度民众是否会因为边界争端，忽视自己身边亲人的健康甚至生死？况且，处理边界问题和国内抗疫是不矛盾的两件事，印度政府也有能力同时进行。因此，很多人分析边境争端时，有意无意地陷入了过度的“自我代入”困境，影响了判断力。

叶海林指出，有观点认为中印可以尝试进行抗疫合作，帮助印度渡过难关，让其在边界问题上不和中国“捣乱”。这种建议是否具有可执行性？从学术分析转化到对具体政策讨论的时候，可行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因此不能轻率地对此下结论。此外，不少观点认为受印美关系影响，印度在边界的举动是为讨好美国。实际上，从 1962 年到现在，印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都历经很大的变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似乎并没有受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化，因为它是有自我逻辑的。

叶海林最后表示，总体上看，此次会议的讨论很好地反应了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关注的一些切入点，为此他也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中印两国互动模式中，不符合国家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般行为模式的，是中国还是印度？实际上面对边界问题，印度和其他大部分的国家行为没有什么区别，能进就进，不能进的时候不轻易

承诺，承诺了也可以背弃。这些在中国看来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其实是国家行为的常态。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印度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是我们不一样，还是印度不一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其次，对于未来中印互动的展望。目前印度对华政策是阶段性的，还是边界冲突会成为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中国对未来中印关系的态度是怎样的，对目前的状态有哪些新对策？第三，边界问题在中美印三角中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没有边界问题中美印三角关系是否会不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胡仕胜在点评时表示，莫迪政府此次在边界冲突前后的动作以及对话外交示强，是各方面综合考量的结果。中印关系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中美关系，中印两国相互比邻，且同为新兴大国，历史上又有过节，这样一对双边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双方各有各的考量，发生任何事态都正常。因此，分析一个事件时，要把它放在一个纵向的时间轴和横向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综合评判。

从大的历史角度看，中印关系带有历史的遗患，两国对待殖民秩序可谓天壤之别，导致了目前一系列的问题。中国认为殖民秩序让国家深受屈辱，内心是驱之而后快，印度则对殖民秩序感恩戴德，因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奠定了印度基本的框架。因此，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认知，必然会导致双方对殖民遗产态度的不同，这其中涉及到边界问题、涉藏问题、双边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处于结构性难解的状态，有时缓和，有时紧张。研究整个中印关系，历史观是两国关系的起源，需要非常重要的给予注重。

研究中印关系，还应注重社会观研究，这之中包括两国传统文化、政治生态等。比如印度教种姓制度在其外交战略上是发挥着很大作用的。种姓制度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分三六九等的，且强调职业世袭制，这就导致印度的精英阶层和平民社会是脱节的，整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安全战略主要由精英阶层制定。中国人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印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来看是“匹夫无责的”。精英阶层设计的战略外交和普通民众日常的诉求非常不同，因此可以看到尽管印度社会整体上仍很贫穷，在疫情非常严重时外交战略仍是咄咄逼人，甚至不惜切断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印度精英阶层和社会阶层是相互剥离的，精英阶层有时会利用平民阶层对政府的不满意大做文章，此次也是。

与此同时，还应考虑两国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因素。除了之前提到的 manthan，曼陀罗思想也是印度外交不同动向背后的逻辑支撑。这种思想强调在能占优势的时候就要占，不能占优的时候要隐忍，强调可以通过紧逼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实际上其本身带有强力的务实主义，在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有明显体现。当前印度对华政策示强，主动挑起边界多点对峙，与莫迪上台后推动的国家再造、国族再造、文化再造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主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主张对中国示强，能够在国内享有很大的政治支持。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总结时表示，举办新芽沙龙就是希望能为青年学子提供发表自己见解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逐步成为优秀的学者。今天各位发言人围绕中印关系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对进入学

术研究领域时间不是很长的同学们来说相当不错。但同时，今天的活动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几位发言人的发言有些就事论事，基本集中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这是不够的。如果去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一定要去寻找当地的资料，这样才能找到更全面合理的依据，要用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规范讨论问题。第三，做国际研究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比如谈到中印关系，要了解中印关系过去究竟是怎样的，要了解什么是“前进政策”，什么是印度所谓的“科学边界”，如果没有对基础知识充分的理解，就无法跳出边界问题看中印关系。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在总结时指出今后新芽沙龙的发展方向。首先，要对某个问题进行学术化的多元探讨。比如此次探讨涉及到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政治学等，未来还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加入，要坚持多元化。其次，强调新锐性即要做到守正创新。要在现有的基础研究上求创新，增强分析问题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甚至对于一些大家比较认同的观点也拿出来进行批判讨论。第三，要突出选拔性。针对某个领域的问题，要从全国范围内对参与者进行选拔，找出那些在不同学科领域有代表性的观点。最后，希望能形成一个学术网络。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不仅要在学校内部做区域国别研究的推进，也致力于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区域与国别研究。

新芽沙龙·第 20 期

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日本

2020 年 7 月 15 日

今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自新世纪以来面对的一场重大挑战，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为此，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新芽沙龙，邀请国内外青年学者就中国与周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发展进行研讨。本期沙龙聚焦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会议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徐传博主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由凯宇的发言围绕中国如何应对日本在华产业链转移这一主题展开，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介绍日本安倍政府出台产业链转移补助金制度的背景；第二，分析这一政策出台的原因；第三，探讨中国应对的主要措施；第四，对以上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

由凯宇首先介绍了产业链转移补助金制度。2020 年 4 月安倍政府出台“促进供应链转移补助金制度”，一是鼓励产业链（零部件与材料的采购及供应网）生产据点重返国内，二是促进海外产业链生产据点多元化。前者计划总额 220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45 亿元），对生产据点转移至日本国内的企业提供 3/4 的设备引进费补助；后者预算共计 235 亿日元，用于支持日企将海外的生产据点迁至其他国家。

由凯宇认为，日本出台这一政策涉及三方面原因。第一，新冠疫情导致日本经济和国内就业遭受较大冲击，消费低迷、

外贸下降、旅游收入减少、生产供给减少和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5%。同时，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上升，恢复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目标迫使日本政府出台这一政策。第二，新冠疫情使日本意识到国际产业链的脆弱性和过度依赖中国的安全隐患。疫情暴发之初，中国政府关闭工厂、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使部分产业的零部件供应受阻，日本国内医疗防护物资生产能力受限，物资短缺。第三，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政策配合特朗普政府的产业链“去中国化”，强化对华制衡，试图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获取战略主动。

为应对安倍产业转移政策的负面影响，由凯宇认为中国应重视提升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重新确立制造业成本优势，发展数字经济等降低服务成本，巩固全球产业链枢纽的地位。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即将丧失的背景下，中国应大规模引进工业机器人，提升制造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借助中国齐全的工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链和广阔市场，维持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枢纽地位。与此同时，面对生产基地服务成本上升的问题，中国应有效利用数字经济优势，在信息通讯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和区块链技术，逐步扩大线上交易规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便利化，从而降低获取商业信息和交易的成本。有效发挥消费市场的吸引力和完善工业体系是维持全球产业链枢纽地位的关键。

总而言之，虽然安倍政府试图推动在华产业链回归国内，或转移至东南亚，但实际上其政策受产业结构因素影响有限。

日本在华低端制造业会随着劳动力成本升高等因素转移至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但高端产业短期内转移在华产业的意愿不大。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制造业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水平以及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重新确立中国的生产成本和服务成本优势，进一步引领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系博士马轶民的发言聚焦近期日本政界在香港问题上的动向。发言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日本政府在港问题的动向，第二部分以党派为中心分析日本政界的行动和其内在逻辑，第三部分以政治家个人为中心分析各种政治家的行动特点，第四部分分析日本政治社会环境对中日关系走向的影响。

首先，日本政府在港问题上没有参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联合行动，保持低调态度，避免刺激中国。然而，随着七国集团峰会召开，日本态度发生转变，摆出更为明确的批判姿态。马轶民认为，日本这一态度转变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作为七国集团成员，日本此举仅仅是在履行成员国的义务，保持本国在七国集团组织及主流发达国家中的存在感和话语权，向美国展示维护日美同盟、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决心。总体而言，日本在港问题上的对华态度是逐步升级的，但一直保持着克制和审慎。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行动主要受到日本民众、盟国尤其是美国以及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其次，以党派为中心考察日本政界在港问题上的动向，可以发现除日本维新会和日本共产党等极少数中小党派外，

多数党派的声明内容措辞和缓、暧昧。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也相继提出了“克制”的要求。事实上，各党派在香港问题上基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但另一方面，在野党试图借题发挥，以香港问题向安倍内阁施压，体现了对安倍长期政权的排斥。自民党在香港问题上表现出的激进态度实际上是对安倍政权的保护，不仅迎合了日本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主流心态，彰显了执政党与欧美及国内主流价值观的契合，同时也规避了以政府形式声明激怒中国的危险。而其它在野党的积极表态，则有借题发挥、影射和抵制安倍长期政权之嫌。随着安倍晋三政权的稳定和在野党的弱小化，自民党与官僚机构结成的利益网日益紧密，在野党的生存空间也日益缩小。2020年5月发生的“黑川事件”被视为行政干预司法的行动，香港问题与此相契合，因此成为在野党影射安倍政权长期执政侵蚀日本司法的可用素材。

第三，相对于党派集体行动的“审慎”，日本政治家在个人活动上的个人活动和表态更为活跃。党派政治家、无党籍政治家以及部分前政府官僚针对香港问题频繁发声并策划各类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他们在国内的社会声望，争取选民支持。一些政治家以个人或结成团体的形式展开活动，通过党内提案、组织研讨会、网络平台发声、自由撰稿和媒体访谈的形式扩大自身影响力。总体而言，政治家个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些政治家更为关注日本国内政治现实，其政治活动具有“内向性”，地方选民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

马轶民指出，日本政界在香港问题上的表态并非单纯的

外交问题。对日本中央政府而言，香港问题不仅事关国与国间的关系和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还关系到执政党（自民党）在国内社会的影响力与“合法性”。对在野党和政治家个人而言，香港问题的直接矛头虽指向中国，但其背后所指往往是安倍政府及其所代表的自民党，成为向政府和执政党发难、笼络政治资源的有效手段。总而言之，日本政界在香港问题上的种种表态，与近年来日本国内的政治大环境紧密相关。在安倍长期执政的背景下，以执政党为代表，日本政治社会出现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反动”趋势和决策的“集权化”倾向。自民党的独大与政府威严的突出，对中小政党的生存空间产生了挤压，积蓄了不满情绪，这成为在野党借题发挥、态度激进的内在原因。

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生许一堯的发言题目是《“蜜月期”的日越关系是否会泰极生否？》。他的发言围绕安倍政权下日本政府与越南关系的演变展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日本与越南关系的总体发展状态，第二部分介绍日越关系蜜月期中的各种问题，最后对日越关系的发展进行总结。

2013年安倍执政后，日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日越政治关系不断加深，密切程度史无前例。日越经济合作也不断拓展，重点涉及贸易、援助、投资等领域。日越双边贸易额从2014年的250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378.7亿美元。自1992年以来，日本始终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2018年日本对越投资达到86亿美元，一度成为越南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另外，日越两国在安全领域尤其是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

断加强。日越两国军事官员频繁互访，在 2015 年建立了“日越战略伙伴关系对话”框架，在 2016 年分别构建起副部长级防务政策对话和警察部门副部长级磋商机制，并谋求开启由外交、防卫、海洋安全相关部门官员共同参加会谈的“3+3”机制。此外，日本还向越南提供大量水上装备，提高越南的海上执法能力，向越南提供军事培训帮助。日本还通过积极参加各种双边或多边军演，加强军舰和战机对越重要港口的战略性停靠，强化日越安全合作。由此可见，在安倍的大力推动下，日越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了顺风顺水的“蜜月期”。然而，由于安倍自身政策上的矛盾和日本外交中一些固有的问题，日越关系在“蜜月”的背后，实则暗流涌动。

蜜月期中的日越关系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安倍晋三的“价值观外交”给日越关系投下阴影。长期以来，日本外交以实用主义为原则，重利益轻价值观，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他将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外交”和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印太战略”相融合，将和平演变作为对越外交的一项内容。越南成为日本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层面需要拉拢的对象，同时又是一个“价值观外交”上的“异类”，这种矛盾使得日本近年来对越一方面大力接近，另一方面却试图渗透促变，这导致日越关系存在走向冲突与对抗的风险。第二，历史问题给日越关系带来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入侵越南并造成了 1945 年的越北大饥荒，这成为日越关系中无法绕开的问题。而日本则利用自身的外交优势，采取淡化历史、否认历史的态度，

以经济援助取代道歉和赔偿。随着越南经济发展、政策变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的出现，日越关系将面临巨大冲击。此外，日越两国的民间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越日本人远远少于在日越南人，随着越南移民带来的犯罪、非法就业、文化冲突等问题，日本国民对于越南的负面认知将出现爆发式增长。相应的，越南对日本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国家形象在越南开始下降。

许一尧认为，日越关系的未来仍然充满波折。安倍晋三在推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夹杂着价值观外交的内容，强行将自由主义的目标塞入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中，既要实现力量平衡，又要干涉他国政治制度，最终自相矛盾。越南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全方位外交为目标，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加之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共同筑成日越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但对日外交并非越南外交中具有决定性的方面。中国强大的国力无疑对日越两国形成巨大的优势，因此将影响乃至左右日越关系的发展。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土居健市的发言围绕日本多边卫生合作的历史和特征，以及新冠疫情背景下日本的多边合作。

土居健市首先介绍了日本多边卫生合作的历史脉络。日本的多边卫生合作主要以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ODA）为主，而日本 ODA 的数量经过了几次重要的变化，1997 年之前日本的 ODA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而不断上升，1997 年后开始出现下滑，直到 2015 年后才有所恢复。与此同时，支持并资助国际组织也是日本参与多边合作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

手段日本政府希望提升国际组织的专业性，提升日本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进而向全世界推广日本模式。

新冠疫情暴发后中日两国对国际社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得益于中日两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在国际发展方面的合作。2018年后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后双方达成了共识，同意在国际发展领域加强对话和人才交流，加强在联合国等传统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也推动民间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建设新型的多边合作机构。另外，双方通过“东盟+3”机制推动地区合作，推动地区良性竞争。

最后，土居健市认为，战后的全球卫生治理是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兴行为体的加入，应对各种疾病，加强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提供不可或缺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新冠肺炎病毒引发的全球危机背景下，多边合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美国表明了将退出世卫组织，但同时中国将加强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对日本来说，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采取了相反的方针，而日本则采取强化多边合作的方针。在此基础上，日本将进一步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加强多边卫生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红叶夏姬从中日疫情防控模式的相似性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思考。她首先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疫情防控措施的差异，并从国际视角出发更多地关注中国和日本对国际社会疫情防控的态度，最后探讨了中日疫情防控措施的相似性。

回顾疫情期间中日政府采取的各类措施，两国的防控模式呈现鲜明对照。中国的防控特点是全面控制，日本的防控

特点是精密攻击。中国严格控制了病毒可能传播的所有“线”与“面”，从而实现了无漏洞的防控成果。日本则区分了个体感染与集体感染、轻症感染者与重症感染者，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在控制集体感染，在这种战略下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防控成果。

虽然中日两国的疫情防控模式不同，但如果把眼光放到国际社会，可以看到一些中日两国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疫情防控的效果来看中国与日本都属于成功的一方，两国都已从疫情危机中解脱出来，开始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第二，中日两国都宣传自己的防控模式的有效性。中国始终重视世卫组织的作用，与世卫组织及时协调政策，世卫组织也高度评价中国疫情防控的成果，中国政府还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此外，中国政府积极输出防控物资，鼓励各国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日本防疫模式也得到了世界的肯定，被联合国秘书长视为成功经验。由此来看，中国与日本对内、对外宣传的思路比较相似，两国都重视国际组织对自己措施的积极评价，试图建立自己的模式并希望他国跟随。但实际上，中国模式的高度强制性、日本模式的高度主动性都源于两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即两国都具有较高集权程度的政府。国家与国民的配合也是关键因素。

疫情防控背景下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值得思考。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美国将中国的卫生合作和对外援助视为威胁，导致疫情防控的政治化。而中日两国可以通过医学合作乃至其他卫生领域的合作加深两国关系，同时，日本外交

的实用主义倾向也有利于两国的合作。疫情期间日本对华外交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日本政府没有强调中国的责任，而是认识到是第二波的蔓延导致日本疫情的扩大；第二，日本政府没有将疫情期间中国的医疗援助政治化；第三，日本拒绝参加批判中国的声明，这说明日本政府还处于犹豫阶段，尽管存在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但日本表现出与美国相反的外交姿态。

最后，红叶夏姬认为，中国的防疫是“高度管控型”，日本是“高度主动型”。两种模式都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不仅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也需要国家和国民的配合，这种配合的程度取决于疫情防控战略本身的内容，这是由两国的国情决定的。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硕士研究生丹羽启介的发言题目是《日本企业转向“去中国化”？》。他认为日本企业并不会转向“去中国化”。

丹羽启介认为，新冠疫情期间日本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是供应链的中断，中国生产基地的停产将会导致供应链中断，使销售和生产活动更加困难。2020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了“供应链改革”计划，动用2500亿日元的预算，支持日本企业将医疗用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回日本，或者将生产基地搬迁至东盟国家。这是日本政府首次直接支持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转型。

然而，这并不会导致日本企业“去中国化”。回顾日本企业供应链战略的历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开始将国内的生产基地迁移到海外，以应对“广场协议”后

日元快速升值的局面。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破坏了部分国内供应链，进一步促使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而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长快的中国则成为日本制造业的集中地。在经历了 2003 年非典肆虐和 2005 年中日关系恶化后，日本企业开始推行“中国+1”战略，将其制造基地分散到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以避免其制造基地集中在中国。然而，将制造业基地全部转移至东盟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基础设施、关联产业和人力资本方面东盟国家均逊于中国，搬迁也将导致日本企业失去中国市场。目前看，新冠疫情不会促使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移出中国，一方面需要复杂供应链的高附加值行业的生产基地很难从中国迁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中国市场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日本企业无法承担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促使日本企业开始做出改变。由于中国政府对国际旅行的限制，日本企业不愿向中国派遣驻在人员，并且由于驻在人员的缺位很少影响企业的运行，日本企业将认识到派遣驻在人员的必要性不大，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生产基地的本土化。另外，目前日本企业的本土化水平存在明显不足，日本驻在人员占据管理岗位，导致中国员工失去晋升的机会，将打击中国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由于日本管理人员无法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既无法推进业务的展开，也无法实现更好的现场管理。总之，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日本政府推出了供应链改革政策，但该政策无法有效吸引日本企业转移其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日本企业将改变自身的经营战略，通

过加强本土化水平，任用中国本土管理人才，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上述发言分别进行点评。第一，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日本企业的供应链中断是日本政府出台产业转移政策的主要原因。面对这一政策引发的挑战，中国应该积极思考应对策略。第二，目前日本政府内部的对华态度确实出现了一些改变，但是各党派的意见分歧并不会影响日本政府的最终决策，事实上目前的改变主要是外部因素造成的，日本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日美关系和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影响。第三，日越关系的核心仍然是安全合作，而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对日越关系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沿着这一思路可以进一步发现越南与欧美国家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是否也有着自身对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这对研究当前日越关系蜜月期背后的问题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第四，疫情后的多边合作势必存在着一个指向性的问题，即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在多边合作中肯定要指向第三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如何进行市场合作，值得关注。第五，对中日两国疫情防控的比较是值得赞赏的，但在比较中日疫情防控时相同仍然大于差异，而防控疫情的重点仍然是互助与合作，因此中日两国将继续保持这种互助与合作的趋势。第六，日本企业的去中国化实际上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去中国化不断被向前推进，并非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出现的问题，这种去中国化事实上也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中国如何应对这种问题值得进

一步思考。最后，吕耀东认为，此次疫情是一个国际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各国应该采取合作的态度而非对抗的姿态，单纯考虑国家自身利益，放弃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正是美国当前行为的出发点，因此大国的担当就是要以公共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初晓波针对上述发言指出以下问题。一是学术态度的问题。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客观、理性地描述和解释乃至预测未来发展的情况，这是学者和新闻媒体或网络文字的不同之处。学者应该尽可能地做事实判断，尽量慎重地做价值判断，避免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目前中国有“战狼外交”，中国学界也有“战狼论文”，因此学者要实时反省、换位思考，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了解研究对象，避免采取以己度人的方式自说自话。在比较中日疫情防控模式的过程中，要避免归因的逻辑错误。所谓“日本模式”的成功不仅仅是日本政府的成功，还与日本民众的素质和隐忍密不可分。

二是资料的选择问题。学术研究无非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去研究一定的资料，得到一定的结论。但仅仅依靠罗列事实是无法做出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在选择资料的过程中，对资料不加辨明，以至于看到文字就认为是事实，是无法做出客观准确的研究成果的。比如，日本“知华派”在香港问题上改变对华的友好态度，不能仅仅关注语言的变化，还要分析背后的逻辑。在分析日本政府出台的供应链转移政策时，也不能仅仅关注预算数字，而忽视了实际情况。

三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学者必须有清晰的理论意识和分析逻辑，避免折中主义，因此年轻学者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由凯宇与丹羽启介对日本企业产业链问题的分析，这一问题实际上属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经济学有自身的研究前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不能将这一问题与现实主义的利益分析进行简单的结合，而丧失了专业性和对概念的严格界定。

四是关于知识体系建构。目前知识体系的碎片化问题非常严重，包括碎片化的知识体系和碎片化的分析方法。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形形色色甚至彼此相反的信息，最终学术研究变成了碎片化信息的随意拼凑。叔本华说“不能让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因此年轻学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整体性、全面性地阅读经典，掌握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将现实问题纳入长时间段的思考范围和更广阔的视野之中，并以自己的思维框架对所关注的问题加以思考和分析。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对本次新芽沙龙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本次新芽沙龙规模大、覆盖面广，有利于形成青年学者研究的网络，给更多的青年学者创造学术讨论的机会，形成某种学术共同体。